

八十年生事纪事

下

王健◎著



群言出版社
QUNYAN PRESS

八十年生事纪事^下

王健◎著



群言出版社
QUNYAN PRESS

·北京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八十年生平纪事: 全2册 / 王健著. — 北京: 群言出版社, 2014.10

(民盟历史文献)

ISBN 978-7-80256-633-0

I. ①八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中国历史—历史事件—1916~1996 IV. ①K260.5 ②K270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54360 号

责任编辑: 樊 伟

封面设计: 逸品书装设计

出版发行: 群言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1号(100006)

网 址: www.qypublish.com

自营网店: <https://qycbs.tmall.com> (天猫旗舰店)

<http://qycbs.shop.kongfz.com> (孔夫子旧书网)

<http://www.qypublish.com> (群言出版社官网)

电子信箱: qunyancbs@126.com

联系电话: 010-65267783 65263836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法律顾问: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

印 刷: 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6年10月第1版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: 21.5

字 数: 582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56-633-0

定 价: 68.00元(全2册)



【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】

目 录

前言 / 1

写在前面的话 / 1

序言 / 1

上 册

第一部分 1916年—1949年

从出生到走向革命

1916年—1921年 出生~5岁 / 2

1922年—1936年 6岁~20岁 / 5

1936年—1937年 20岁~21岁 / 14

1937年—1940年 21岁~24岁 / 18

1941年—1942年 25岁~26岁 / 30

1942年—1946年 26岁~30岁 / 41

1946年—1948年 30岁~32岁 / 75

1948年—1949年 32岁~33岁 / 90

第二部分 1949年—1965年

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!”从开国大典到深入农村

1949年 33岁 / 132

1950年 34岁 / 138

1951年 35岁 / 157

1952年 36岁 / 171

1953年 37岁 / 195

1954年 38岁 / 208

1955年 39岁 / 213

1956年 40岁 / 223

1957年 41岁 / 238

1958年 42岁 / 245

1959年 43岁 / 258

1960年 44岁 / 266

1961年 45岁 / 272

1962年 46岁 / 282

1963年 47岁 / 291

1964年 48岁 / 296

1965年 49岁 / 323

下 册

第三部分 1966年—1976年

“文化大革命”十年内战

1966年	50岁	/ 338
1967年	51岁	/ 348
1968年	52岁	/ 356
1969年	53岁	/ 364
1970年	54岁	/ 368
1971年	55岁	/ 376
1972年	56岁	/ 387
1973年	57岁	/ 393
1974年	58岁	/ 400
1975年	59岁	/ 412
1976年	60岁	/ 423

第四部分 1977年—1996年

“解放思想,实事求是,团结一致向前看”

1977年	61岁	/ 444
1978年	62岁	/ 454
1979年	63岁	/ 461
1980年	64岁	/ 469
1981年	65岁	/ 474
1982年	66岁	/ 482
1983年	67岁	/ 490
1984年	68岁	/ 497

1985年 69岁 / 505
1986年 70岁 / 512
1987年 71岁 / 521
1988年 72岁 / 540
1989年 73岁 / 549
1990年 74岁 / 556
1991年 75岁 / 579
1992年 76岁 / 589
1993年 77岁 / 608
1994年 78岁 / 619
1995年 79岁 / 640
1996年 80岁 / 654

后记 / 667

跋 / 669

第三部分 1966年—1976年

“文化大革命”十年内战

1966年 50岁

民盟中央开展对吴晗《海瑞罢官》的批判 《二月提纲》彭罗陆杨反党集团 以陈伯达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成立 聂元梓的一张大字报 中共中央发表《五一六通知》和《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》 毛主席写《炮打司令部(我的一张大字报)》 红卫兵上街反“四旧” 毛主席检阅全国红卫兵 北京市中学红卫兵勒令民盟自动解散 红卫兵到民盟批斗吴晗、章伯钧、千家驹等人 民盟中央造反派分别成立“燎原造反派”和“驱虎豹战斗队”

新年一过,民盟中央即组织座谈会,座谈姚文元文章,批判吴晗《海瑞罢官》。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多数不理解,不同意,特别知道姚文元是姚蓬子的儿子更不服气(据说姚蓬子在文学界有劣迹)。

4月初,戚本禹又发表了一篇《〈海瑞骂皇帝〉和〈海瑞罢官〉的反动实质》在《人民日报》和《光明日报》同时刊出。戚本禹吹捧姚文元的文章“揭开了这一场不可避免的大论战的序幕”,实际是根据毛主席的讲话把对吴晗的斗争从学术转入政治。民盟中央于4月中旬作出决定:从即日起对吴晗进行正式批判。接连多次举行大型座谈会。冯友兰、金岳霖、贺麟、梁思成等人都来参加,座谈气氛更显得严肃紧张起来。

2月间,彭真作为文化革命小组组长(共5人,1964年成立)召开了小组会,拟定《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》(简称为“二月提纲”),这个提纲试图把已经出现的极“左”的倾向适当加以约束,把

运动置于学术讨论范围内,不赞成把它变为严重的政治批判。这个提纲最后送给毛主席审阅。毛主席严厉地批评了彭真,并指责《二月提纲》混淆阶级界限、不分是非,是错误的。毛主席谈话后,中央书记处于4月停止了彭真的工作。

就在中央研究《二月提纲》的同时,林彪委托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,会后写出了会议纪要,经过陈伯达、张春桥共同修改(据说毛主席也看了改了)。后以中共中央文件批转全党,并按语:“纪要对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形势分析和所提出的原则、方针、政策,不仅适合于军队,也适合于地方,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。”《纪要》也称为《二月纪要》,《纪要》出台,显然是和《二月提纲》对着干的,受到毛主席的支持。

在批判《海瑞罢官》的同时,北京市委机关刊物《前线》因登有吴晗、廖沫沙、邓拓三人的《三家村札记》,也被揭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。

5月间,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《中共中央通知》(后被称为《五一六通知》)。《通知》从批判《二月提纲》入手,提出文化领域和党、政、军各个领域里都混进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问题,“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,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边,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”。同时在这次会议上通过决定,以反党集团的罪名,对彭真、罗瑞卿、陆定一、杨尚昆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和组织处分。会议决定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小组,重新成立中央文革小组,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,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。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是:组长陈伯达、顾问康生、副组长江青、张春桥,组员有王力、关锋、戚本禹、姚文元等。这个组实际上成为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指挥部。

5月底,民盟举行中常会,决定停止吴晗在盟中央和盟市委担任的一切职务。6月中再次召开中常会扩大会议,集中火力,有准备地对吴晗进行批判,连续多次,由学术批判转为政治批判。

费孝通在会上发言,认为这是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,是和平演变。贺麟检查自己过去写了些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书,还不以为然,

现在看来才感觉到自己思想对当前政治上的危害性。叶笃义批判吴晗思想深处的反动性,并作了自我检查,说自己“我的思想就是牛鬼蛇神”。

8月,党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,通过了《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》。决定说:“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。”同时竭力宣扬、鼓励青少年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,这场运动只能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,自己解放自己,要“敢”字当头,不要怕出乱子……

这次中央全会根据毛主席的提议,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,政治局常委由原来七人扩大为11人,增加陶铸、陈伯达、康生、李富春(陶铸和李富春进常委后不久即被排斥,陶铸被迫害致死)。常委排名林彪升为第二名,刘少奇原为第二名降至第八名。会议期间,8月5日毛主席写出《炮打司令部(我的一张大字报)》,指责“在50多天里,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阶级立场,实行资产阶级专政……围剿革命派,压制不同意见,实行白色恐怖……又何其毒也!”这张大字报发人深省,虽未点刘少奇之名,但毛主席和刘少奇之间的矛盾,充分揭露出来。这张大字报指的除刘少奇之外还有邓小平(以后统称他们为“反动的刘邓路线”)。

北京大学某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人在5月间贴出一张大字报《宋硕、陆平、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什么?》,矛头直指北京市委大学部和北京大学党委,措辞强硬地批评陆平等破坏“文化大革命”。最后讲要“全部消灭一切牛鬼蛇神、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,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”。5月底陈伯达接收了《人民日报》,第二天的社论就是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》。

毛主席看到了聂元梓的大字报,立即下令向全国、全世界公布。各地广播电台和《人民日报》当即全部广播和发表了聂的大字报全文。同时《人民日报》还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《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》。在《人民日报》的煽动下,“文化大革命”哄然而起,全国各地报刊都登有各界人士支持聂元梓大字报的文章。



1966年5月25日,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贴出康生授意写的大字报,攻击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。毛泽东称赞它是“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”,并批准6月1日向全国广播。

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发表,引起了更大的反映。首先青年学生立即行动起来,自认“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”,开始集合同学组织“红卫兵”。很快许多中学生立即组织起来。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说:你们的行动“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、农民、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、帝国主义、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,表示愤怒和声讨。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。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”。清华附中红卫兵立即公布了毛主席这封信。从北京逐渐扩展到全国。各学校、机关、团体中红卫兵组织像雨后春笋纷纷成立起来,从此,在中国土地上,红卫兵组织打着“造反有理”这面红旗成为一支敢想、敢说、敢干、敢闯、敢革命的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政治力量。

8月18日,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检阅北京和各地来京的上百万红卫兵。检阅开始,陈伯达和林彪相继讲话,提出了四个伟大(伟大的领袖、导师、舵手、统帅。这四个“伟大”便是从此而来)。毛主席在城楼上从东走到西,举着军帽频频向红卫兵示意。广场上

“毛主席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”的呼声不绝于耳。这次检阅更加提高了红卫兵的政治地位，也再一次掀起对毛主席崇拜的高潮（从此，“毛主席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”喊了十年）。

红卫兵冲向社会，豪言要“向旧世界宣战”，要“大破四旧大立四新”（四旧：旧思想、旧文化、旧风俗、旧习惯）。破四旧像闪电一样立即在全国展开了。

红卫兵没有严密的组织，也没有正规的制度，也没有共同遵守的纪律，成群的红卫兵走向街头巷尾为所欲为。先是大街上张贴标语，向行人散发传单。到处是集会、演讲、宣传，有的改街名（如长安街改为东方红大街，同仁医院改为工农兵医院）。有的闯进前门大街、大栅栏、琉璃厂、王府井、市内各寺庙，砸烂老字号的招牌，没收古董古玩，撕毁线装书，破坏佛像，砍断佛头。北京凡是名胜古迹的地方几乎都有他们的足迹。

红卫兵从大街走进小巷，居民们几乎关门闭户，红卫兵厉声喝斥，闯进即搜查“四旧”，凡是珠宝、绸缎衣服、绣花被褥、旧照片、字画古玩，以及女人的发型、金器、宝石，男人的西服、古书、洋书等当场被撕毁或没收。如果发现“五类分子”，即拉出来揪斗。



红卫兵上街“反四旧”到处抄家

这些红卫兵的“辉煌战绩”受到中央文革和各地党报党刊的表扬。

8月底,毛主席在天安门第二次接见红卫兵。林彪讲话,他高度赞扬红卫兵“杀向社会”的行动。他说:“文化革命已经触及到政治和经济、学术的斗批改,发展到社会的斗批改。群众的革命洪流,正在改变我国整个社会的面貌。”从此各地红卫兵到北京大串联,免费坐车,到处有吃有住。串联者越来越多,同时,破四旧和抄家之风越演越烈,民盟中央机关先后也接待了红卫兵400多人,管吃住接待了两个多星期。

先后听到一些抄家死人的事情。一位文化界的朋友告诉我,8月下旬,红卫兵把著名作家老舍、萧军、戏剧家荀慧生、白芸生等30余人集中到国子监孔庙大院,他们把抄家抄来的“四旧”文物(其中包括他们的手稿和戏装道具等),当着这些人焚烧。30余人都挂上“黑帮分子”“反动学术权威”“牛鬼蛇神”等大牌子,进行批斗。接近古稀之年的老舍,被认为态度不好,受到加倍折磨,回家后就到附近的太平湖投湖自尽了。

南京著名老画家刘海粟是母亲(张曼筠)的学画老师。南京来说,在几天内一批一批红卫兵先后来抄家24次,除留了他的一条命外,他一生收藏的鎏金古董、唐宋陶俑瓷器、宋元明清和他自己的书画以及钻石戒指等被全部抄走。

我的七妹王冷,1948年在解放区读华北大学。解放后随爱人去西安进高干子女比较集中的37中学教书,约一年后又调到西安市八中教语文。文革初期,八中学生给王冷贴了几张大字报,8月下旬,37中高干子弟筹委会“红恐队员”数人,突然到八中把王冷揪去,说她是资本家兼地主家庭出身的“牛鬼蛇神”。在8月31日召开的斗争大会中受伤惨死。

这场破四旧、抄家的狂潮中,我们住在西便门国务院宿舍大院的人是最幸运的了。宿舍建于解放初期,是周总理亲自参与修建成的。大院400多户人家,绝大多数是国务院下属单位的领导干部和工作



王冷同志生前照片

人员,还有照顾一些离休养老的老红军老革命。当时红卫兵运动主要是革“文化”的命,还没有注意各机关、单位领导层的当权派,而且社会上的,包括我们大院里的红卫兵不少是高干子女,所以这次破“四旧”,对大院表示相当信任,红卫兵没有冲进来,只在大门口墙上贴了一张布告,要求住户自觉破“四旧”,自觉革命,所以这场灾难我们幸免。我们觉得这个大院是北京唯一的一块太平乐土了。但下半年红卫兵内部发生派系之争,

越演越烈,甚至到武斗,从此我们的大院也无宁日了。

4月间国男从冀东四清回来即回医院工作,运动基本上尚未展开。力平的学校已停课闹革命。力平上的是西单师范大学的实验二小(十年一贯制,包括小学和中学),学校很出名,许多高干(如刘少奇、乔石、刘长胜、杨成武、薄一波等)都送子女入学。学校受到运动冲击,出现大字报,但同学们年龄较小,所以尚无动静。但这场运动对她们也不无影响,力平已11岁,性格刚强,好为人先,红卫兵出现后她和一些较大的同学已蠢蠢欲动,但一时还未组织起来。

7月下旬,民盟中央召开中常会,决定成立机关“文革办公室”,胡愈之任办公室主任,李文宜任副主任,机关干部洪密、詹永泰、周克欧、黄景钧和我等都是办公室成员。以办公室名义举行座谈会,学习党中央《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》,并贴大字报对吴晗进一步深入揭发批判。

8月24日凌晨,民盟中央接到北京市八中红卫兵的“通告”,勒令民盟组织限期在72小时内自动解散,第二天民盟以办公厅名义,

在门外贴出公告：“民盟完全接受红卫兵的意见，自即日起停止办公，报请中共中央处理，特此公告。”同日下午，北京市八中红卫兵70余人，来民盟中央机关召开批斗吴晗大会。他们事先有所准备，陪斗者有章伯钧、千家驹、张毕来和机关“三反”有历史问题的干部近十人，吴晗等跪在地上，每人颈上挂一大木牌，写上他们的罪名。红卫兵批斗后，宣读《致民主党派最后通牒》，当晚红卫兵8人到民盟进行封查，胡愈之秘书长代表民盟中央交出中央委员会及办公厅两枚公章。从此，民盟中央工作全部陷于停顿。民盟各地方组织也相继停止活动，甚至办公用房被强占，文书档案和办公设备遭洗劫。

千家驹被斗后回到家里，家里已被抄得一塌糊涂，爱人女儿均受了皮肉之苦，抄家后房东立即逼他们搬家。他们想着90岁的老母亲如何安排，这时又有一批红卫兵来家开批斗会，千家驹被逼得已走投无路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千家驹一个人走出家门，先去姐姐家看看姐姐，然后买了一瓶二锅头，乘上公共汽车到了香山，爬上“鬼见愁”，喝了二锅头，想在半醉时跳崖自杀。他在山顶徘徊时，有一行人发现他神色异常，看他走在山崖边时，就追过去盘问他，他支支吾吾，行人翻他衣服找到工作证，知道了他是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，行人拉着他找到电话，通知他们的机关，机关派了小汽车把他接回去。

千家驹也想走沈志远自戕之路，虽未能如愿，但同样遭到造反派“畏罪自杀”“自绝于革命，自绝于人民”的谴责。

在这几个月里，除每天到民盟机关参加批斗外，还经常去统战部和政协。去统战部听报告，讨论问题，研究对吴晗计划，传达周总理对吴斗争三原则：(1)人人参加；(2)划清界限；(3)组织一些有分量的战斗性文章。7月份还听徐冰作关于班禅叛乱的报告，会后徐冰指示如何编辑吴晗罪行资料。

9月底，在党员大会上又听到张经武传达关于徐冰所犯方向性错误的报告（李维汉下台后由徐冰接任，徐冰下了台，由张经武接任）。统战部也开始乱起来了，特别造反派组织抄档案事，泄露了国

家机密，损失很大。

我去政协主要是去学习委员会办公室，向程绯英同志汇报机关学习、批判出大字报情况，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，总结经验，并布置干部学习（学习过焦裕禄、老三篇）。曾一帆（学委会主任）同志向大家介绍各党派批判吴晗的情况，交流经验。据曾一帆统计，4月底各党派贴出大字报共3700张，农工党最多，列为榜首。各党派开展出大字报的竞赛。

我们的党支部是由民盟、民进合成。除民盟原有党员外还有民进的杨东莼、许广平，民盟的刘清扬、邓初民。一次支部会谈知识分子和统战工作问题，有些年轻的同志说，这次文化大革命，知识分子全暴露出来，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都有；这些年民主党派除了放毒以外，没起什么好作用，没有民主党派不等于没有统一战线，苏联十月革命后，有统一战线工作，没有民主党派也可以。

10月底，党支部讨论陶铸传达中央工作会议毛主席、林彪的指示，陈伯达的重要讲话和周总理解答问题。这次会是党十一中全会的继续，斗争十分尖锐激烈，刘邓作了书面检讨，解决了各自为政的组织分散主义，以后不存在两个司令部，去掉了党内一大隐患。不久，陶铸也成了批斗的对象。

11月初，全国政协革命造反团来了一批人，到我们大院里抄了闫宝航的家，并将他带走进行审讯。

我们同闫宝航不但住同院，还是两代世交，来往比较密切。他从政协回来后，我去看他问他这件事，他说政协造反团问他许多问题，问他是否搞过情报工作、和国外情报机关有什么联系等等。这时一部分人去翻他的文件柜，抄去一些文件和信，其中没有什么是属于机密的，其实他早有准备，属于机密文件，已另外收藏。造反团说他问题很复杂，要他如实交代问题。他要他们去问周总理，说周总理是最了解他的，这是吓唬他们的。

据我了解，闫宝航一生“复杂”，就因为其“复杂”而作出丰功伟绩。1941年他得到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的准确日期即报告中央，由